

晋游日记

同舟忠告

山西票商成败记

〔清〕

李燧

李宏龄

著

黄鉴晖

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游日记

同舟忠告

山西票商成败记

〔清〕

李燧

李宏龄

著

黄鉴晖

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游日记 同舟忠告 山西票商成败记

〔清〕李 燧 李宏龄 著

黄鉴晖 校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39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ISBN 7-203-00917-3

K·43 定价: 3.10元

校 注 说 明

(一)

古籍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资料。有了它，前人尚未搞清楚的或者尚未发现的历史事实，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子孙后代，总有一天是会搞清楚和发现的。如果失掉了它，那将使我们永远无法对祖国的历史和古人作出全面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举例来说：在我国所有出版的中国银钱业的历史专著或教科书中，从古代至近代，向人们揭示出中国当铺、印局、钱铺（或钱庄、钱局、钱店）、银号（或银局、炉房）、票号、银行、以及官钱局、官银号等信用机构的历史过程。多少年来，人们认为它们就是中国一千几百年的全部银钱业历史，并没有人去怀疑它。但是，随着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史实告诉人们，过去关于银钱业历史的出版物，并不能完全说明中国银钱业的历史，因为把“账局”遗忘了。

账局（清末叫账庄），发生于清雍正乾隆年间，是银号之后票号之前的一种银钱业，从事工商业借贷并兼放钱，官吏放款，在我国北方一些城镇和中俄恰克图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衰败，约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账局从发生到今天，已经过去二百五十年了。二百五十年间，由于

天，我们所以能发现账局这种信用机构，完全靠的是古籍和历史档案。《清高宗实录》首先告诉我们京师有账局放官账；李燧乾隆末年著的《晋游日记》，又告诉我们账局是山西汾州府商人携资去京开设的；《王侍郎奏议》卷三说明，在京账局主要是对工商业放款的；清历史档案说明，宣统二年全国尚存账局的户数，资本额，资本主，经理人，分局，经营存款、放款、买卖生金银、发行银两票等业务，以及它们开业的年代。由此说明，整理保存古籍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极为重要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整理保存古籍其所以紧迫，还由于某些古籍刻印数量有限，目前存世极少，甚至成为孤本。《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就属于这一类的古籍。《晋游日记》记载山西各府州名胜古迹、人物、风土、经济、乡试等等，不仅山西省没有藏书，而且全国收藏的也极少。《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是反映清末票号兴衰的商人信件，由作者自费石印，图书馆几无收藏，仅有从民间搜集的一册，而且已经破损，如果再不整理重印，将有湮没的危险。

正是为了抢救古籍和为研究山西地方史提供资料，在省高校古籍整理管理部门的资助下，我们将《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三部线装书校注付印。同时，因为这三部书篇幅有限，不宜单独印刷，故合编一册出版。

(二)

《晋游日记》，原名《雪爪留痕》，作者李燧，字青璫，直隶省河间府人。与山西学政戈源同府，被戈聘为幕僚。戈源（1738—

1800年)，字仙舟、橘浦，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七日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七日（1792年1月30日——1795年9月29日）任山西学政。李燧于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五日（1793年5月24日），由江苏铜山县动身来晋，至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五日（1795年5月1日），任山西学政幕僚，共两年零一个月，写日记三卷。第一卷写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卷写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初十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中因妻子丧事回籍停笔八十五天，即六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无日记），第三卷写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四月十五日。作者自乾隆五十八年五月进入山西境界之后，在两年的时间里，游历了平定州（今平定县）、寿阳县、榆次县、太原省城、徐沟县（今清徐县徐沟镇）、祁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县、霍州（今霍县）、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平阳府（今临汾市）、侯马镇（今侯马市）、闻喜县、夏县涑水头、运城、解州（今运城市解州镇）、虞乡县（今属永济县）、蒲州府（今永济县）、绛州（今新绛县）、曲沃县、翼城县、沁水县、阳城县、泽州府（原凤台县，今晋城市）、高平县、长子县、辽州（今左权县）、和顺县、乐平乡（今昔阳县）、忻州、崞县（今原平县）、代州（今代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州（今岢岚县）、宁武县、朔州（今朔县）、马邑县（今属朔县）、怀仁县、大同郡城（今大同市）、天镇县、沁州（今沁县）、屯留县、潞安郡城（今长治市）、交城县、文水县、汾州郡城（今汾阳县）、洪洞县等四十八个府州县城，而且有的府州县城两次过往，谈古论今，领略形胜，记了近四万言的日记。

《晋游日记》成书于乾隆六十年四月，由同僚同乡刘廷楠作序，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周寿椿作跋，与作者嘉庆年所著《西征录》一并，由其孙李钧编辑，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刻成书，版藏河南省河南府署(治所洛阳)。《晋游日记》存世只见到这一个版本，同时存有手抄本一部。抄本与刻本，在封面设计，每页的行数、字数等方面完全一样，像是刻本的底本，但抄本优于刻本：一，抄本正确的字，刻本刻错了许多。“予”错成“子”，“代”错成“伐”，“祐”错成“祐”，“具”错成“其”，“冒”错成“冒”，“曰”错成“日”，“已”错成“巳”，“己”错成“已”等等，类似错误，共有十六处；二，一些常用字，刻本又刻成异体字或古体字，增加了人们阅读的困难。比如，“夢”刻成“𦵄”，“陶”刻成“陶”，“輒”刻成“輒”，“旒”刻成“流”，“參”刻成“叅”，“階”刻成“階”，“凶”刻成“凶”，“聶”刻成“聶”，等等。当然，刻本也有它独到之处，即将抄本一些不规范的字，刻成规范的字。如，“束”改刻为“束”，“貯”改刻为“貯”，“竝”改刻为“竝”，“宿”改刻为“宿”。优劣相较，我们采用手抄本做校注的底本。另外，手抄本“序”有三十二个字残损，以刻本作了校补，并在校补字上用了“□”号，以示残损。

《晋游日记》虽只有三万七千多字，但与同时代地方志相比，对于研究山西地方史则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其价值所在：第一，日记记录了一些府州县的经济和工商业概况，这是一般志书所没有的。在卷一和卷三里，有关经济记载有十一处，而且有的是对山西经济贸易状况的概括，以及某些行业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的记载。平定州“地出铁矿，穷民皆采铁

为生”，而且“州人多业染采”，“人文甲于通省”。“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河），市尘辐辏，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竞曳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化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汾州“民称殷富焉”。“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汾州出外贸易者，首为“富人携贯入都，开设账局”；“其次则设典肆”。全国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文水地产葡萄，色紫而皮厚，可以晒干。土人插柳为架，周环数十里。想见秋夏之交，绿云缭绕，紫玉累垂，洵足观也。”“羊羔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澄澈，风味远出襄陵之上。”就连榆次县什贴镇也有“人烟稠密，为一巨镇”的记载。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此书的价值。在公元一七九五年及其以前的这些记载，有的一百几十年后县志才有了反映，而且还说不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缺少时间概念。譬如，汾州人多贸易以及以钱、当两行为主的经济情况，嘉庆《介休县志》尚没有记载，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新修《介休县志》才有下列记载：“介休商业以钱当两商为最，其他各行商号，均系兼营并驾，绝少专业，亦无大资本家。至邑人出外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庄、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账，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行邑人最占多数。”《晋游日记》的记载，不仅早于同时代的志书，而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说明史实完全无误。清度支部档案藏有宣统二年全国九十二家账局注册的案卷，其中记载开业最早的一家叫“祥发永”，就是由汾州府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四万两白银，于乾隆元年（1736年）在张家口开设的。

第二，《晋游日记》汇集了作者所经府州县的主要名胜古迹、山川险要、古今人物、乡土风俗，阅读后不仅使人对三晋形胜有个概括的了解，对于今天纂修地方志和保护古迹具有参考的价值。《晋游日记》对于上述各方面的记载，共有七十几处，是日记的重要内容。这些记载，大多数是作者耳闻目睹实情的叙述，少数则来自各种史籍，而且有的还作了考证。譬如，解州关帝庙，不仅记录了庙宇建筑布局、雕塑绘画、树木花竹、水池莲蓬，而且考证了关帝始祖。如说，在“结义园”后荫，有“龙爪槐二株，老干拳曲，圆覆如盖”，十分壮观。“圣配祠”有题联云：“生何氏歿何乡已不可考矣，夫尽忠子尽孝可不谓贤乎！”作者依据宋牧仲《筠廊二笔》所载，详述了帝祖考二世的生卒大略之后，说：“是夫人有氏可考，祠联云云，岂未见此墓碑耶”，故不可信。在记述古今人物中，除历代政治家、文人之外，记述了当时有名的“神童”和文人。“安邑景芝荣，少以神童称，甫能言，即善属对”，十三岁以前“作古文诗两卷”。沁州葛培初，文才出众，雍正十二年十岁时应童子试，领冠军，士而未官，居家为民，世称“处士”。在乡土风俗方面，说到太原元宵节有燃“塔火”的习惯，“每于元夜，当门攒石炭，高数尺，以火然之”。“街衢照耀如昼，巨观也”。从而又说明太原煤炭采掘业的发展。

第三，日记辑录的诗词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全书辑录的诗词共六十七首，作者所作四十一首，同僚所作十五首，他人或古人所作十一首。在这些诗词中，歌颂山西形胜和人物三十一首，写知识分子情感和灯红柳绿生活的三十七首。一些诗词对于形胜的描写是值得一读的。乾隆六十年闰二月

初一日（1795年3月21日）流连晋祠胜境作长诗一首：

东风吹绿回溪田，柳条袅袅紫丝鞭。
两月株守如蠖屈，青山到眼何新鲜。
一丛竹树霭林郁，危楼杰阁纷钩连。
行人指点悬瓮曲，翦桐遗迹留千年。
磴道盘纤蹶云影，石罅汨汨鸣流泉。
水底灿烂金碧色，夕阳倒影回波圆。
苍松一树势天矫，五丁擘处孤根联。
半体偃蹇卧平地，几枝突兀撑青天。
摩挲不如何代物，使我怀古心茫然。
流连胜境不忍去，四望漠漠生墟烟。
山灵有知应寄语，去来信宿皆前缘。
客子上马僧闭户，回首山月仍娟娟。

《晋游日记》整理出版是具有价值的。但也有它的局限，或者错误，须要指出。首先有的记载或考证并不准确，把外省外地的古迹山川，记成山西某些州县的，如果不注意，会造成以讹传讹，遗害无穷。王昭君是汉元帝宫人，名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予昭君，以结和亲。昭君出塞，后身亡，葬于匈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世称青冢。而作者不仅说：“昭君墓，在阳和（阳和卫，明置，清废，故治在今阳高县境）”，而且还说曹秋岳备兵阳和，曾至其墓，并对昭君“墓前石案刻蒙古书，先生考绎最详，拓数本归”。这显然不是事实。类似问题，还有几处。其次，迷信的东西，被说的活龙活现，似乎真有其事。譬如，乡宁县儒学教官曹兆凤，安邑县人。丁酉年中乡试归里，路

经曲沃县隘口村时，被野鬼捉弄，徐后山记入《柳崖外编》。曹兆凤精中医。作者两次在平阳患病，皆由曹医治痊愈。闲时，李燧询之曹被鬼捉弄之事，曹答属实，李即“信然”。又如说，清顺治二年，翼城县东有一妇女，受娠后，至六月，忽呕血数升，随吐一小儿，长半尺许，耳目口鼻悉具。再次，镇压李自成的周遇吉，被颂为“忠臣”，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三)

《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作者李宏龄（1847—1918年），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自幼好学。因家庭中落，少年时就到钱铺学徒，不料术成而钱铺败。故于同治元年，经邑人推荐，在蔚丰厚票号做事五十个春秋，先后主持该号京师、上海、汉口分号号事三十来年，曾倡议各票号合组大银行，是山西票号的一位改革家。

当合组银行未能如愿后，李在民国二年辞去号事，归里闲居。课孙之余，偶检旧稿，汇编成卷，在好友催促下，民国六年自费石印《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同舟忠告》是作者在任蔚丰厚票号京师（今北京）、上海、汉口分号经理期间，即光绪十六年至民国元年（1890—1912年），写给总号总经理们的信件的一部分，共七十六件。信件主要是谈论票号号事振兴和改革的事情。作为夥计与东掌，或者职工与资本家、总经理来说，共做票号生意，如同共乘一舟，故书取名《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是作者在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1908—1909年），在京联合在京祁县、太谷、平遥

三帮票号各分号经理，并以三帮票号名义，倡议各票号共同入股，并广为招股，集成数百万两资本，创办三晋汇业银行，所写给三帮票号总号的信件，以及重庆、成都、汉口、西安、济南、奉天、营口、兰州、广州、沙市等十地票号响应倡议的回信和劝导总号促成的信件。作者认为，合组银行可以作为票号的后盾，使票号在同大清等等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保晋人之利益。后因合组银行之事未成，作者把它视为票号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书取名《山西票商成败记》。这两部书，全是商人的信件，比之官府档案、新闻报纸反映商界史实，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开商埠，设租界，控制海关，勒索赔款，输出资本，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外国洋行和银行势力由沿海深入内地，大肆掠夺和剥削，经济危机频繁，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业深遭破坏，一批一批地破产倒闭。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和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电报、邮政、铁路、轮船等交通事业以及银行事业相继兴起，特别是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和各省官银钱行号的设立，大小银行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出现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新形势。

山西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的银行业。因为它发生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起源于埠际间的汇兑，而且由山西商人创办和为主的经营，故不叫银行，而叫山西票号、票商、票庄、汇兑庄等。十九世纪末，票号有二十八家，它们在全国八十多个城镇和香港、朝鲜国仁川、日本国

神户、大阪、东京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近四百个，曾执中国金融之牛耳。随着时势的发展，票号业务与盈利虽一度繁荣昌盛，但同时也出现了衰败的危机。作者两书的信件，除谈论用人之道和如何适应时势开展业务外，主要是针对这一形势谈论票号改革的。

第一，在铁路、轮船交通运输发展的形势下，票号派往各埠分号夥友的班期应该改革。票号派往各分号的夥友，长时期以来是三年一班。在此期间，不准回家，并写在号规（即章程）内，违者以犯号规论处。这种规矩，或者是从便于夥友熟悉各埠生意，或者是从节省盘费着想，但日长年久，对夥友健康和世道人情，均有不合。刚完婚即被派出的夥友，三年不准回家，有点不近人情。初次离家，不适应南方炎热、潮湿气候的夥友，面黄肌瘦，身患湿症，似应照顾。年过花甲之人，非少年可比，“若必拘定三年下班之例，势必坚辞不出”。因此，他建议，一般的班期可改为二年，年老者可改为一年。他说：“平心而论，火车往返极便，与号事无伤，而与伙友有益”，“车费亦属无多，与前迥不相同”。

第二，应该开展电报汇兑业务，不能因小失大，耽误顾主。票号经营的汇兑业务，长期以来只有票汇和信汇两种。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发展，社会上普遍要求票号办理电报汇兑业务。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各票号相继开办了电汇。可是，蔚丰厚票号当事人偏要停办电汇。他们认为：“我号准其电兑银两，已试办一年，救他人之急需，我号所得兑费亦属寥寥。少得兑费属小，关乎利害甚大，与其追悔于后，莫若及早回头，各庄以（光绪十七年）二月底即行停止。”作者起初亦以为停办电汇为是，当他

分析形势后，觉得此策不可取，所以三番五次函劝总号不要停办电汇，反之“势必耽搁买卖”。他说：“各省电会银两已属通行，若咱号一家不用电会，势必耽误主道。比如，我号旧日之主道，或有电会款项，势必至别号电会，别号可由生而熟；为日既久，我号反因之由熟而生，即有不用电会款项，亦恐由别号会兑。是生意未必因电兑格外生色，却恐因停止电会减色，此亦不可不虑。”

第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通商口岸一再开辟，外国洋行、银行增多，中国进入一个商战世界。然由于总号总经理的决策，往往与多变的时势相背，给业务带来损失。作者为了有利于业务的开展，多次建议资本家、总经理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两次，借以了解各地市场形势，长知识，开脑筋，克服固守总号，不了解外情，盲目决策的失误。如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至我国，“方今出洋游历者，非但学界之人，即王公贝子亦均出洋考察政事，讲求商务。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立？故弟以为非但星垣兄必须出外考察，即四东亦应出外一游，以观世变。”“弟以为，出洋原可不必，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一看。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月，细思有利无弊。”

同时，在各商埠因中外共事，一来须语言文字相通，二来有时也要借外人保护，于是作者主张培养通外语的人才。如说：“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意外之事（指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有一

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较之携帐而逃又高一筹乎！”

第四，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国内官商银行、官银钱局号的发展，和外商银行的延伸，许多商埠拥有众多的中外银行、账局、票号、钱庄、官银钱局等银行业，银行林立，竞争激烈。这时，票号不仅失去过去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或主要势力的地位，而且一遇倒帐，损失往往多于外商银行和大清等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它的生存出现了严重危险。《南洋官报》和山西冀宁道员发表文章，敦促票号改革，组织大银行，以求生存。在这种形势下，作者亦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为此，作者在光绪三十四年联合京城各票号经理，与票号进步资本家渠本翘，商定合组银行章程，先后四次上书各票号总号，两次当面陈述，以及渠本翘亲临各总号详陈合组银行之利益所在。同时，作者将上总号书散发全国各重要商埠票号，一时间博得各地票号积极附议，纷纷上书总号劝说总经理们迅速决策，勿失时机。其时，平遥帮票号总经理首推蔚泰厚票号毛鸿瀚。毛鸿瀚（1846—1922年），平遥梁村人，顽固守旧，不察时势，以老眼光看待变化了的时局，总以为票号不合组银行亦安然无恙，故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于是，轰动票号界的合组银行的倡议化为泡影。

《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体现了作者的改革思想。票号终因不改革，在竞争中吃了败仗，偶遇辛亥与壬子事变，破产倒闭了。作者在付印两书的自叙和序中，写道：

“进言者惟欲急起而直追，听言者视为虚文而敷衍。迁就因循，日复一日，时机坐失，谁之过欤？！”

“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绕朝之赠策士会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区区之意，窃有感于斯言，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原始要终，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这就是整理出版两书的价值所在。

(四)

《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三书的整理和校注，分下列几方面：

一、原书为竖排，不分段，没有标点。现改为简体横排，并适当分段，标出标点，以便阅读。

二、《晋游日记》原书一册，共分三卷。每卷首均刻印有“晋游日记卷一（或卷二，或卷三）原名雪爪留痕 河间李燧 青墅”等字，现予删节，只标“卷一”、“卷二”、“卷三”和每卷的起止年月日。

三、商人信件分“正信”和“又及”两类。有的信件有“正信”又有“又及”，有的只有“又及”而没有“正信”。为了把信件区别开来，我们在每件信开端，用（）号标出信件的顺序号，如（1）（2）（3）……。

四、《同舟忠告》汇编的信件，原排列在时序上有些混乱。我们按信件内容和时间作了调整。调整结果（按现编号）如下：（10）至（13）原为信首，现改排在（9）之后；（25）

原排在(43)之后,(28)、(29)原排在(39)之后,(45)原排在(20)之后,现均按顺序号调整过来。

五、原书中的缺漏和错字,用〔〕号予以增补和改正。

六、残缺字下加圆点。

七、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利用古籍,注释比较广泛。凡需注释者,在正文中以①②③……表示,而注文一般都注在每卷或每信之末,并用比正文小一号的字排印。但,诗词未作注释。

八、由于本人水平所限,整理校注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